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2016年 第叁辑 总第 ⑦ 辑

杭州文史



杭州出版社

杭州文史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2016年 第叁辑 总第7辑

杭州
文
史
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文史.第7辑/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565-0607-1

I. ①杭… II. ①杭… ②杭… III. ①文化史—杭州
IV. ①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5210号

杭州文史（第7辑）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李利忠

版式设计 吴 郡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印 刷 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40千

印 张 8.25

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607-1

定 价 28.00元

《杭州文史》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叶 明

主 任：孙忠焕

副 主 任：赵光育

委 员：宋 涛 包伟民 袁成毅 刘 颖 陈红民
陈 野 周 膺 钮 俊 郭清晔 张 帆
王利民

《杭州文史》学术委员会

主 任：包伟民

委 员：陈高华 南炳文 刘迎胜 李治安 邓小南
荣新江 冻国栋 陈红民 张 帆 楼 劲

《杭州文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宋 涛

副 主 任：王利民

委 员：董郁奎 楼毅生 项文惠 房友强 夏卫东
王 英 吴志坚 倪素浓 孙立波 吴 晨
张学勤 徐吉军 陈永革 李 宏 陈志坚
欧燕萍 陈江明 黎毓馨 郑嘉励 姜青青

主 编：王利民

副 主 编：张学勤 倪素浓 陈江明

编 辑：申屠军 赵鸿涛 周 佳 徐晓玉



“杭州文史网”是杭州文史研究会主办的，以宣传地方历史文化知识、展示杭州文史研究成果的杭州首家专业的文史网站。欢迎关注“杭州文史网”，及时了解杭州文史新动态！



“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是杭州文史研究会主办的，向公众推送杭州文史研究成果和杭州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平台。欢迎关注“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增强与我们的交流互动！

目录

学术纵横

- 杭州“因塘而存”背后官方主导的积极因素 姜青青 / 001
钱塘江海塘的水神祭祀文化 陈方舟 / 033

名家印象

- 夏承焘先生给我们讲宋词 顾志兴 / 058

文史讲堂

- 葡萄美酒自西来
——有关中国古代中西交流的有趣猜想 卢向前 / 063
方志中的分野与地理坐标 杨彬镛 / 083

城史探赜

- 闲话南宋都城临安坊巷名称之由来 龚剑锋 温正灿 / 089

武林旧事

- 打百姓 辱太守 冲臬署
——晚清杭州八旗兵丁的出格恶行 张学勤 / 101

史料译编

- 日本《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卷》杭州史料译编（五）
交通运输及邮电〔二〕 施茂华 翻译 / 107

口述历史

- 我与舞台结下的不解之缘 严先来 口述 蒋羽乾 整理 / 118

杭州“因塘而存”背后官方主导的积极因素^①

姜青青

杭州的“因塘而存”，就是基于海塘这样一类超大规模的社会公共建筑设施的营建。而能够调动和集聚更多资源的以国家为背景、为依托的官方组织，成为海塘营建成功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学者魏特夫认为，在治水环境中，“国家比社会强有力”^②。历史上杭州海塘的建设从依靠私人之力取得的短期成效，到官方主导力量的介入，并以谋取长效机制的建立，最终使得杭州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名城之一。

本文研究立足于杭州“因塘而存”的历史，故论述的重点以杭州各个历史时期如临安府、杭州府等行政辖区内的钱塘江北岸海塘建设为主。而且，历代钱塘江筑塘防潮尤以北岸为重点，海塘工程也以北岸最成体系，因此本文以北岸海塘的修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即今杭州市区直至海宁市盐官以至海盐一带的钱塘江北岸海塘。事实上，北岸海塘是一个整体，沿线各地各城市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北岸海塘整体上的安全，对于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杭州来说，至关重要。又，“海塘”概念因历代视角不同，或以功能、或以用材、或以地段，而在名称上也不尽

注释

①本文为2015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钱塘江古海塘研究”重点课题，编号：2015QTHHT04。

②[美]卡尔·A·魏特夫(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第三章《国家比社会强有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相同，如“大塘”“土塘”“石塘”“捍海塘”“障海塘”“障江塘”，以及“江塘”“海塘”等等，本课题除引用的文献原文之外，表述上一律以“海塘”相称。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偏重于官方主导对于人文进步的积极因素，所以，尽管官方对海塘建设的巨额经费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积极因素，但因为不少著述中已有详尽论述^①，故有关海塘经费问题本文未有专门讨论。

一 从海塘“逸史”看“官方色彩”的隐现

学术界现在通常根据《水经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中不约而同引用到的《钱唐记》记载的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把杭州地区最早的海塘营建时间上溯到东汉时期。但是，我们仍能在一些文献和遗世实物中，找到更早于东汉时期海塘建设的蛛丝马迹。因为这些海塘“痕迹”实在过于模糊，并不被以往学术界所关注，所以我们权将其称作海塘建筑史上的“逸史”。

1. 早期钱塘江海塘营建即隐现“官方色彩”

南宋《咸淳临安志》所绘《盐官县境图》^②中，在临江“捍海塘”以北内陆，又有“范蠡塘”的标示。同书根据“耆旧所传闻，简策所著记”又有文字记载：“范蠡塘，盐官县西三十五里。”^③明代《嘉靖海宁县志》也记载道：“范蠡塘，在县西三十五里。故老云，昔越王进西施于吴，尝取道于此。海坍不存。”^④明代县志引民间传说认为“范蠡塘”只

注释

①如陶存煊、周潮生著《明清钱塘江海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有《经费》一章专题叙述。

②[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六，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11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③《咸淳临安志》卷八六，“宋刻本”第36册。

④[明]蔡完：《嘉靖海宁县志》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其次，“范蠡塘”的可能存在，还因为范蠡在越国重大工程的营建上，曾得到越王勾践的全权委托。越王勾践七年，勾践在入臣吴国后返回越国，随即开始了复兴越国之举，其中的建城和宫室营建上，他全权委托相国范蠡主持。《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①《越绝书》也有范蠡筑城的记载：“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决西门，亦有事。到始建国时，蠡城尽。”^②

从这两处文献记载看，范蠡修建山阴城以及越王宫室等重要建筑，道法天象与自然山川，安排城市重要出入交通，在当时应属通晓“营造学”的人物。虽然《吴越春秋》中一字未提范蠡修建海塘的事，但范蠡对堤塘工程并非无知，他曾在分析吴国能否长期保持霸主地位时对勾践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倡，气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掩其量。燿干之火，不复其炽。”^③这个巧妙比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范蠡对堤塘的功用是颇多体会的。

从《盐官县境图》来看，“范蠡塘”的长度大大超过千年以后的吴越国“捍海塘”，由“盘山”向东直抵盐官县城，其地理位置东边已经接近当时吴越两国的交界处“御儿”^④（也作“语儿”“语溪”，今浙江省嘉兴市附近），在今天看来，这一带正是杭嘉湖平原的核心区。所以历史地

注释

- ① [汉]赵晔(周生春辑校汇考):《吴越春秋》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 ② 《越绝书》卷八,第58页。
- ③ 《吴越春秋》卷八,第193页。
- ④ [三国·吴]韦昭:《国语解》“越语上”第二〇:“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第5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看“范蠡塘”的积极作用，当年越王勾践之所以最终能够逆转吴国，称霸一时，或许就与“范蠡塘”捍卫了这片“粮仓”之地有关。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或许正是由于“范蠡塘”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抵挡了强大涌潮对钱塘江北岸农田民居的侵袭，从而为杭嘉湖平原之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稻米主产区奠定了基础。

“范蠡塘”为春秋末期越国大臣范蠡所营建，这一观点如果成立，则早期钱塘江北岸的海塘建设即隐现一种“官方色彩”。

2. 秦代官印“浙江都水”：最早的一抹官修海塘的“影子”

上海博物馆现藏一方铜印，称“浙江都水”^①，来源于龚安顺和龚安庆的捐赠，青铜质地，蛇钮，纵2.5厘米，横2.5厘米，高1.75厘米，白文篆书，田字界格，为治水、收渔税之官印。



秦印“浙江都水”铜印，原刊《上海博物馆藏》

沙孟海先生《浙江都水官印考》一文认为：“凡印文四字带有田字界格及印文两字带有日字界格而篆体还不十分方整的白印文，金石学者一直认为秦代和西汉初期印……根据以上意见，我们鉴定这方‘浙江都水’印应是秦代或西汉初期的制作……‘浙江都水’这个官，顾名思义应是专为钱塘江水利而设……此印不知何时出土。《望古斋印谱》《龚怀西藏印》皆曾收入。”^②

除了沙孟海，在此印的年代归属问题上，当今虽然也有著述把它归

注释

①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②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291页。

入汉初，如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但很多考古和印学界的专家认定它是在秦代，如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和许雄志《秦印技法解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都将它归入“秦印”之列；刘婉撰文认为，秦封泥中有“都水丞印”“琅邪都水”，经过详细比对后，可以推定此印（即“浙江都水”印）为秦官印^①。而我们再看《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也把“浙江都水”印归于战国秦国之后已统一六国的秦代。

“浙江”在《史记》记载中出现了六次，除了捎带了一个汉初的同姓王“吴王濞”（即后来“七国之乱”的主谋人），其他涉及浙江之事，均为秦代和之前的战国时候。《汉书》提到的三处和《后汉书》的一处“浙江”，所属年代也在秦朝时候。事实上，把“浙江都水”印归入秦代，还有诸多基本历史事实上的依据。秦朝是一个特别重视“水”的国家，战国秦昭王时李冰父子在巴蜀地区营建了“都江堰”，秦王嬴政执政前期在关中修筑了“郑国渠”，兼并六国后又修建了技术绝妙的“灵渠”。这三座水利工程，不仅举世闻名，更重要的是惠泽后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而秦人对于水利的重视，也体现在相关职官的设置上，如秦印“水印”（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以及“都水丞印”“琅琊都水”和“琅琊水丞”等秦代封泥。

再从秦代官方的“崇尚”来看“水”对于秦人的重要性。《史记》记载，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②“封禅书”还提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③可见，“水”代表着

注释

①刘婉：《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理论界》2009年第2期。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索引”，第238页。

秦国以及秦王朝的基本“国运”，连带颜色上也确定了黑色为国家推崇和需用的基本色。总之，处置事务每每以“水”为本。秦始皇之所以千里迢迢“至钱唐”，并冒险渡江直奔会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祭大禹”，而大禹以治水享誉天下，自诩“水德”的秦人怎会不对他顶礼膜拜呢？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浙江都水”印最有可能是秦代时期的一方官印。令人关注的是，这方秦代官印对于“浙江”职官的“审别职任”直指水利（“都水”一职可解释为水利主管），这当是“浙江”大潮自然而然“推举”出来的职官，或者说，治潮之患（包括修建海塘等）必是“浙江都水”的职责范围。

只是秦祚太短，那个“浙江都水”官吏可能还未来得及施行理水治潮的职责，便随着这个秦王朝的覆灭，消失得杳无踪影。所以，从杭州海塘建设史的角度来评估这方秦代官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抹官修海塘的“影子”，尽管它在历史上一闪而过，而且很有可能了无作为。

二 史上私人主导营建海塘成功者甚少

1. 华信修筑的“防海大堤”当是“半拉子工程”

纵观历史记载，由民间出资或组织的海塘建设非常少。而从寥寥几处记载来看，营建海塘成功者更少。

最早记载杭州地区营建海塘的是东汉时期的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此事是否属实，学术界存有争议。但以当时中国南北两部几乎同时诞生的北魏郦道元（约470—527）《水经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463—521）注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引用到的刘道真《钱唐记》一书，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

宋刻本《水经注》引用的《钱塘记》记载：（灵隐山）“山下有钱塘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塘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符（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幕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

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①

南朝梁刘孝标曾在刘宋文帝时期为钱唐县令，他在为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作注时，把刘道真《钱塘记》写为《钱唐县记》，记事相仿，但相对简略。《世说新语》原文：褚裒“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刘孝标在此文之下引注：“《钱唐县记》曰：县近海，为潮飘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犂土为塘，因以为名也。”^②

华信以自己一家之财而成防海大堤，民众得以安居乐业，“钱塘”之名也由此而来。但是，后人指出，早在秦始皇渡“浙江”时，钱唐县名即已存在，又何必要由东汉华信来“创立”？因此而认为华信筑塘一事很值得商榷和怀疑。

细读酈道元的引述，我们今天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信筑塘后县名改成“钱塘”，此事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故改名钱塘焉”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秦代和西汉时的“钱唐”被王莽改作“泉亭”之后，现在因为华信出钱修建了这个海塘，又被改作“钱塘”（“钱唐”和“钱塘”稍有不同），这一更名不应成为怀疑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的理由。



宋版《水经注》有关《钱塘记》

注释

- ①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7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此“宋刻本”殆为现存《水经注》最早版本，引文括号内文字系作者根据文意所补。又，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朱儁传》也引《钱塘记》云云，字句稍有差异，详见《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页。
- ② [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卷中《雅量》，“尊经阁丛刊”日本昭和四年影宋本。

《钱塘记》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杭州确已在东汉之际修筑海塘工程了。杭州城市的起步，应该是因为这条海塘工程而开始的。

然而，古代杭州城市的起步实在是很缓慢的，东汉直到隋代开皇九年置杭州（初治余杭，未几移治钱唐）之前的近6个世纪时间里，“它的地位，始终只是一个山中小县”。^①移治钱唐后20年，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杭州成为大运河的一个起讫点，地位日渐重要，但它繁盛而成为东南名郡却要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②，其间又过了近两个世纪。可见，杭州最后能够成为东南名郡，东汉华信私人定制的“防海大塘”在其中未必起到过什么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而我们细细玩味郦道元引述的这一记载，“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即使最终这一大塘因华信的狡黠而确实筑成，那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粗糙“毛坯”。后人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修筑的竹笼海塘、囤石海塘、鱼鳞大石塘等重型海塘，犹难抵御大潮侵袭而屡遭溃塘之灾，一条仅靠土石简单堆筑的“半成品”堤塘，又怎能有效抵挡汹涌而来的潮患？相比于后来的官方主导的大型海塘工程，东汉“防海大塘”充其量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最多将就于一时，而无以长治久安。

2. “四条汉子”的修塘壮举：海塘史上一脉相承的“悲剧”

今杭州市下城区有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名“潮王路”，大路跨京杭大运河，有桥名“潮王桥”。所谓“潮王”，即唐朝杭州的一位乡贤石瑰，因修塘而死于潮水，杭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绩，建“潮王庙”以纪念他。

“潮王庙”原在上塘河东，朝晖新村北端，最初名叫“石姥庙”。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石姥庙，在德胜坝。其神石瑰，当唐长庆间

注释

^①谭其骘：《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南北朝前古杭州》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②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李华作《杭州刺史厅壁记》，其中有“杭州东南名郡”之称。[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6页。

(821—824)，江涛为患，神竭家资，筑堤捍之，竟死于事。屡见灵异，守臣上之，咸通中（860—874），封潮王，故俗称潮王庙。”^①清代《浙江通志》的记载更详细一点：“潮王庙，《仁和县志》：‘在芳林乡，神为唐石瑰。’僧本诚《潮王庙记》：‘按晏殊《舆地志》，古有石姥祠旧碣载，石姓瑰名，生于唐长庆三年（823）。钱塘古称涛江，民苦潮害。王奋力筑堤以捍水势，祁寒剧暑不辍。功未就，竟死于潮。后为神。咸通中，官为立庙，封潮王。’”^②

石瑰修塘与东汉华信修塘有相似之处，即自己出钱组织营建工程。而石瑰在“竭家资”和“祁寒剧暑不辍”这些方面，显然不是华信可相提并论的。当然，华信在组织人力上的耍诡计、失信于人这些方面，也不可比之石瑰。石瑰修塘的结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也成为杭州地区海塘建设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石瑰所修之塘最终建成与否，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海塘这样的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非官方组织而不可，否则，极有可能会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

唐宋以后在海塘营建工程上，官方的组织实施逐渐取代了民间私人的偶尔为之，而成为一种“常态”。但是，似乎仍有竭尽个人之力修筑海塘的事例发生，这可以从钱塘江沿岸一带类似石瑰“潮王庙”的祠庙中找到一些“其人其事”。

元代海宁教场有“彭乌庙”，《海塘录》引《海塘通志》称，该庙“祀元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彭文骥、乌守忠”。清代的“彭乌庙”在海宁春熙门外七里海塘上。彭、乌二人事迹据清代衢州府知府白丰的一篇碑记称：“雍正三年，余奉委修筑海塘，往来塘工去宁邑东七里，有庙曰‘彭乌’。询祀何神，土人为余言：‘一姓彭，讳文骥，字德公；一姓乌，讳守忠，字子朴。世同里闾，家素封。元泰定三年海溢，朝命筑塘，费不

注释

①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三，“西湖文献集成”第3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② [清]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二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给。二神罄家资助之，坍塌不已。时有迁民内地之议，神曰：生不助其成，死必捍患，何内徙为？未几，陷于海。大显灵异，海患顿息，塘成，而民卒不徙。闻于朝，立庙以祀。明嘉靖三十年，塘大圯，神又显灵。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明王。’”^①彭文骥、乌守忠两人都是海宁富户，虽无官爵封邑，却富比封君，两户人家住得又近，估计关系也很不错。许是这一原因，所以朝廷一毛不拔，却下令由他俩承担这次筑塘大任。于是，尽管他俩和石瑰不同的是奉命筑塘，但落得的下场和石瑰完全一样，任凭家资耗尽，海塘依然不修，最终惨死于江潮之中。在这次修筑海塘中，官方的不作为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彭、乌二人的筑塘，事实上无异于华信和石瑰，都是举个人之力而为之。

又，清代《康熙仁和县志》记载：“茶槽庙，在会城东，当钱塘尽界^②。沿江七十里，北至皋亭山，屡受潮患。永乐间，新城茶商陈旭出囊中金，筑新塘。后乙未，皋亭山洪水与江潮相接，沿江俱没，塘坏。旭思资蓄已尽，功不成，遂跃身入潮。尸随潮浮至皋亭山，沙随尸而涨，塘乃成，尸随葬焉。巡抚入告，敕封茶槽土地兴福明王，迄今二百余年无潮患。士民戴德，奉其神，各方建祀，有上新、中新、下新等祠。”这则故事如果除去其中的一些“神话”因素后，可以发现陈旭筑塘的几个问题：一是他的这次筑塘基本上是他个人出资兴建的，未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基本上是耗尽了陈旭的所有积蓄。二是陈旭所筑新塘的质量称不上上佳，在潮水和洪水的夹击下，处于整体上的坍塌。三是新塘的被摧毁应是灾难性的，场面惨不忍睹，最终导致陈旭的绝望而投江自尽。四是官方在这一事件中对新塘建设并无实质性支持，地方大员只是在陈旭死后上报朝廷，为陈旭讨得了一个封号。可见，陈旭之死和石瑰又有不同，石瑰奋力

注释

①《海塘录》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据《海塘录》卷一二引张朝纲《重建下新土谷祠记》，茶槽庙在杭州庆春门外十里。又，据南宋《咸淳临安志·浙江图》所载，“茶槽衙”位置距钱塘江边甚近，“茶槽庙”与“茶槽衙”或为同一地方。